

蔣介石與民國學人 關係的嬗變 (1932-1949)

• 鄭會欣

摘要：民國時期的學人是在中國轉型時期成長的一代知識份子，他們身上既存在崇尚自由、追求民主與清高獨行的特點，亦具有傳統士大夫那種「齊家治國平天下」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作為黨國元首，蔣介石自然是希望天下才士盡為其所用，亦曾禮賢下士，並延攬多人加入政府。但他同時又十分忌恨知識份子身上那種獨立意識和自由精神，甚至不惜加以迫害。儘管黨國體制的特徵與民國學人心目中的民主自由絕然不同，但為了抗日禦侮，他們仍然擁戴蔣介石作為抗戰的最高領袖。然而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依然堅持一黨專制，迫害異己，經濟上更是政策失誤，腐敗橫行，通貨膨脹，致使知識份子生活日益貧困，對國民政府的態度隨之發生轉變。本文主要依據蔣介石與顧頡剛、竺可楨、鄭天挺等人的日記，觀察蔣介石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變化，以及這些民國學人如何由對蔣介石順從、與之合作，到最終雙方徹底決裂的過程。

關鍵詞：民國學人 蔣介石 顧頡剛 竺可楨 日記

民國時期的學人是在中國轉型時期成長的一代知識份子，他們當中雖然知名者不多，但社會地位很高，生活待遇優渥，深受人們尊敬。他們生逢家國存亡之秋，懷抱學術報國的使命感，身上往往具有兩重性格：既受西方自由主義精神的感召，強調科學實證、不盲從權威、崇尚個人自由、保護個人權利、反對社會不公、憎惡腐敗、提倡改革；但同時又因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舊學根底深厚，因而多秉承「經世致用」的入世思想，懷抱「學而優則仕」、「讀書救國」的理想。正是因為受到西方與中國傳統的雙重影響，這些現代知識份子與統治權威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張力。為了消除這種張力，有人認為應將他們吸收到建制之內；反之，知識份子就會被推到建制的邊緣而被異化，甚至變成與政府對抗的力量。作為黨國元首的蔣介石，如何對待知識份子這個問題，自然成為他執政過程中的一項重要選擇。

關於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與知識份子的關係，以往不少論著均有所涉及，如陳三井、呂芳上、金以林、王晴佳、王奇生、黃麗安等人的研究即從不同方面探討了這一問題^①。本文則在其基礎上，主要依據蔣介石與民國多位著名知識份子的日記，特別是歷史學者顧頡剛的日記，再參照其他相關資料，從他們各自的筆下，觀察蔣介石在上世紀30、40年代與民國學人之間的互動，並對他們之間的關係予以初步探討。

一 蔣介石開始重視與學界的聯繫

蔣介石自幼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並未受過現代化正式的高等教育，更沒有到西方國家留學的經歷。雖然他對學人有一定的尊重，但基本上還是將士人視為出謀劃策、撰寫文書的幕僚，譬如延聘他少年時的老師毛思誠當他的私人秘書，而他與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的關係就更是一個生動的事例。蔣介石禮賢下士，而陳布雷則抱着傳統士人那種「士為知己者死」的信念，忠心耿耿為其服務二十餘年，成為蔣介石身邊重要的文膽和謀臣。

若說蔣介石的人際網絡，軍人出身的他原本在國民黨內地位並不是很高，早期權勢未穩，依賴的是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黨內元老的支持；國民黨北伐與統一過程中，骨幹力量主要來自軍方將領。在長期的戎馬生涯中，蔣介石大部分時間用於軍事指揮，關心的是如何掌控槍桿子，注意的是奪取天下和鞏固政權，尚沒有時間、更沒有精力去考慮與學人建立關係。雖然中原大戰後蔣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長，但那只是因為要平衡黨內派系間的矛盾，並沒有時間去關注教育，也沒有與教育界人士建立聯繫。在蔣介石一步一步走向權力中心的過程中，1932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份，這一年他開始體會到知識與人才的重要，並逐步與眾多學人建立聯繫。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因而有了一段時間進行反省，他感到以往之所以失敗，其中「對於學者及智識階級太不接近，各地黨部成為各地學者之敵，所以學生運動全為反動派操縱，而黨部毫無作用，且有害之」，即為主要原因之一^②。他認為他所缺乏者「為外交與教育之大意，而對於該兩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羅，而對於國內之策劃與國外之交際，亦無專人貢獻」，因此計劃今後「對於外交、教育與財政人才，應十分收攬；而對於策劃之士亦應注重」，並決定「當於每星期研究一次或二次，一面可以交換智識，一面可以選拔人才，而且得以聯絡感情也」^③。不久蔣介石重新上台，即將他的計劃付諸實施，而中間的牽線人，除了陳布雷之外，主要是他盟兄黃郛的妻弟、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的錢昌照。

此時國際國內局勢愈發緊張，蔣介石聽從錢昌照的建議，決定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調查全國的資源（包括自然與人力兩大資源），並聘請各方面的專家擔任顧問。錢昌照向蔣介石開出了一份四五十人的名單，其中軍事方面有陳儀、洪中、俞大維、錢昌祚、楊繼曾等，國際關係方面有王世杰、周覽、謝冠生、徐淑希、錢端升等，教育文化方面有胡適、楊振聲、傅斯年、張其昀等，財政經濟方面有吳鼎昌、張嘉璈、徐新六、陶孟和、楊端六、王崇植

等，原料及製造方面有丁文江、翁文灝、顧振、范旭東、吳蘊初、劉鴻生、顏任光等，交通運輸方面有黃伯樵、沈怡、陳伯莊等，土地及糧食方面有萬國鼎、沈宗瀚、趙連芳等，可謂集結各界精英，皆為一時之選，其中大部分人後來都成為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④。

以往與學界並無多少聯繫的蔣介石，此時開始考慮如何任用人才，他以為「求賢才皆不易，當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培德〕、朱驩先、朱逸民〔紹良〕、張岳軍〔群〕、賀貴嚴〔耀祖〕、蔣雨岩〔作賓〕；次之如陳立夫、葛湛侯〔敬恩〕、俞樵峰〔飛鵬〕、陳公俠〔儀〕；遠者如程滄波、劉健群、何浩若、梁幹喬、趙龍文；次之如張道藩、羅志希〔家倫〕、顧樹森、彭學沛，皆有一日之長。如欲求其全才，則何可多得？」^⑤他運用各種方式，譬如接見、談話、吃飯，乃至於聘請他們為之講課，先後接觸了很多著名的學者。對蔣介石來說，這樣既可以補充個人的知識結構（重點是科學、經濟與外交），更重要的還是從中考查和發現合適的人才，並為其所用^⑥。他在1932年的日記中對此多有記載，如4月12日：「晚與中大教授四人談話，皆為書生，葉元龍略有見地」；13日「下午會客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中大劉光華皆有見解，非書生可比」，但同日接見的其他二十多人卻「皆平平之也」。5月17、19和20日，蔣介石連續三次聽取馬寅初介紹國際經濟之大勢，「皆甚見效」。這些接觸對蔣介石的影響很大，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極思準備時期組織之重要，而且組織以人為重，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識淺見少，坐井觀天之錯誤也。」^⑦

在這批學者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著名的地質學家翁文灝，在蔣介石的日記中有相關的記載。6月17日，蔣介石聽翁文灝講到「中國煤鐵礦業之質量，東三省幾佔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國鐵礦，為倭寇所有權約佔百分之八十二以上。驚駭莫名，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佔？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18日晚，翁文灝又為其講解中國各省礦藏之分布，蔣得知中國「所缺者為銀與銅，而最富者為煤，為鉛，為鎢，為錳，為鋁，佔世界第一、二、三位」。19日下午，翁文灝接着講東北與西北農產地之分布，「據其以氣候與雨量而論，則西北只可移數百萬之民為屯墾防邊之用，絕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萬之移民也」。連續多日聽翁文灝講解，蔣介石深深以為，「翁實有學有識之人才，不可多得也」。而翁文灝等人的見解，對於蔣介石日後制訂政策也帶來重要影響。

6月20日，蔣介石約見軍工專家俞大維，發現「此人對於政治、人事皆能留心，且有研究，惟恐其經驗不足耳」。此時蔣介石正在籌劃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他認為成立該會的關鍵就是集聚人才，尤以各組主任最為重要。這一天他初步預定各組人選，其中經濟：馬寅初、劉振東、翁文灝、俞大維；內政：張群、楊永泰、谷正倫、蔣伯誠、朱世明、何浩若；外交：余日章、裴復恒、程滄波、周鯁生、徐漢；法律：王世杰；教育：戴季陶、朱家驊、蔣夢麟、錢昌照、羅家倫。蔣介石以為，「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為政？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陳景翰、余日章三友可為敬友，而不能為我畏友；其他如朱驩仙〔先〕、蔣雨岩、張岳軍、俞樵峰皆較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極守成而已，無勇氣，

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賀貴嚴、陳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狹，不足當事也。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黨務：陳立夫、張厲生、張道藩、劉健群、羅志希、殷錫鵬〔朋〕、方覺慧、齊世英、方治、魯滌平、羅貢華選之。其他如內政、外交、經濟、法律、教育諸部，從長考選，不易多得也。」^⑧蔣介石對他身邊的幹部一一加以排比，覺得還是不敷使用。他曾在日記中寫道：「近思舊識幹部人才，幾無一得，而本黨原有之幹部更難多得。季陶、益之較有幹才，而其消極、懶慢，不能為用，是為最大之不幸。其次則張岳軍、蔣雨岩、朱驩先，亦只能盡一部之責而已。茲假定黨務戴季陶、陳果夫、羅志希、張岳軍；軍事何敬之、陳公俠；政務朱驩先，以馬寅初任經濟，王世杰任法律，蔣夢麟任教育，張岳軍任內政，蔣雨岩、周鯁生任外交，俞樵峰任交通，未知其果能無誤否？」^⑨

6月28日，蔣介石在武漢正式設立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此後他一直坐鎮武漢及南昌等地指揮剿共戰事，其間亦曾多次召見各方學人，聽取他們的意見，在日記中留下了許多記載。譬如聽中央大學清史教授蕭一山講解歷史，認為「其所見者為法度與思想之大處，可佩也」（7月19日）；連續多日聽周鯁生講國際形勢，內容涉及領事裁判權、租界及國際聯盟諸問題，「所得頗多」，並認為周在這方面「甚有研究」（7月20、21、22、26日）；聽徐青甫談經濟問題，胡汝麟講財政問題（7月21、22日）；聽王世杰講英、法、美等國的政治制度，收獲甚大，內心「亦以為然也」（7月27、28、29日）；還聽楊端六講貨幣制度（8月9日），劉秉麟講經濟學，特別注重蘇聯的計劃經濟，內心「甚有所感」（10月10、11、12日）；11月底至12月初，蔣介石在武漢曾多次與胡適見面，交談教育的方針與制度，這也是他們二人的初次相見。胡適認為教育之好壞與制度無關，然而「經費不足，政治波動，人才缺乏，辦學者不安定，無計劃之可能」，這才是教育崩壞之原因^⑩，蔣介石聽了亦感到「甚以為然」（12月2日）；聽李惟果講德國與土耳其的崛起與復興，「甚嘆革命之主義，領袖人格與制度組織，及時機與地點之重要」（12月2、8日）。

這些學者的講述對蔣介石的影響很大，譬如聽了蕭一山談中國歷史上的統治之道後，他就深刻體會到，中國治道「向以黃老與名刑並用，而折中於孔子中庸之道」，故「治國工具以宗教、社教、法律三者並用」；而今天下大亂就是因為「禮教破產，所以思想複雜，法度不立，教禮失效」^⑪。當他從周鯁生、王世杰等人那裏初步了解歐美各國的政治制度後，亦有所收穫，認為要採各國所長，譬如今後的國家體制「於政府，則仿美國總統制；於立法，則仿德國經濟會之三院制；於選舉，則地區與職業制並重；於中央與地方權限關係，則仿法國制；而司法與審計及預算制，則另加研究也」^⑫，並認為「革命計劃以不平等條約為第一對象，以國內腐化份子，為第二對象，各反動派為第三對象」，而無論如何，當下唯一要務，就是「速平內亂」^⑬。

目睹國民黨的現狀，蔣介石又極不滿意，他以為「舊黨員多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因而自問想要尋求德才兼備之士，是否應「在留學生中、大學教授中、職業團體中、舊日官僚而未在本黨任仕有風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⑭？如何改變政府官員的結構與成份，此時便成為蔣介石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當然，在堅持

黨國體制、國民黨在政府內掌控絕對權力的原則之下，適當地遴選一些優秀的學者進入政府，對於鞏固政權絕對沒有壞處，而與學人的廣泛會面也就成了他考核人才的絕好機會。譬如他在聽了徐青甫、胡汝麟講解財政與經濟問題後，深覺其人老練，並以「得識徐、胡二君，至為欣慰」（7月21日）；「今年得劉健群、錢昌照、俞大維、翁文灝、王陸一、羅貢華諸人，以翁最有閱歷，亦有能力，可喜也」（7月25日）；「吳國楨或可造人才，吳任倫亦有望之才也」，「與周炳琳、沈燮若、宣介溪、曹翰金諸人談話，周老練、沈幼浮、宣急」，方知「求知人才之難也如此。余力事選人皆無體系，何能得人成事耶」（7月26日）；「組織與專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現在進行者，翁、錢之組織，近於政治與經濟，而俞之組織近於外交與教育；劉之組織則近於軍事與黨務。最難得者，為外交與財政人才，應注重之」（7月27日）；與吳鼎昌談話之後，也發現「此人確有研究，亦知人事，可以交也。其對於經濟亦有心得」（9月30日）；「李〔惟果〕與劉〔秉麟〕皆可用之才也」（12月2日）；「蔣廷黻及對外交確有研究與見地者。何廉亦實踐力行之人也」（1933年8月23日）。

蔣介石在與這些學者見面的過程中尚能虛心請教，禮賢下士。在與學人的交往中蔣介石受到不少啟發，得益甚多，他們自然亦知無不言，介紹各自所掌握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談話，蔣介石開始注意並招攬其中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為其服務。例如，1933年1月26日，任命俞大維為軍政部兵工署署長；4月21日，任命王世杰為教育部長；特別是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國民政府進行改組，一批重要的學人和專家進入政府，如內政部長蔣作賓、實業部長吳鼎昌、鐵道部長張嘉璈，以及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政務處長蔣廷黻等，被時人稱為「人才內閣」^⑮。這一舉動不僅對政府內部的成員結構有所調整，同時也得到國內學界的一致讚賞。

應該注意的是，雖然蔣介石將一些學人延攬入體制之內，並對其中一些人委以重任，但他對這批知識份子還不是十分放心。翁文灝算是蔣介石十分推重的人選，他就對竺可楨說過，蔣介石做事雖「事無巨細，務必躬親」，但「對於所用之人，概不十分信任」^⑯。在蔣介石看來，「中國學者之大病，在能創造而不能繼續；在富於研究天性，而無工作習慣」，這是因為「農業國之特性，教育、制度、法律，皆須根據於此」^⑰。可見國民政府的統治依然是建立在個人獨裁的黨治基礎之上，知識份子的入閣絕不可能改變國民黨一黨專制的性質。

二 戰時蔣介石對學人的態度

（一）禮遇與倚重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前夕，蔣介石為了凝聚國內民眾抗戰共識，即以「集思廣益、共濟時艱」為宗旨，計劃在廬山召開以知識界人士為主的會議，他以為，「教育以民族光榮之歷史、雄厚之國力與偉大之精神為基礎，而助之以嚴重之困難、無上之國恥，引為人人之責任」^⑱。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談話

會照常進行，並邀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出席，各黨派中包括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國社黨）、農工黨以及村治派、職教派和救國會各方面的領導人，而無黨派人士則主要是各大學校長與教授。中共方面雖然也派周恩來、林祖涵和秦邦憲前往廬山，但並未參加談話會。據統計，出席會議的學者、名流共132人，其中教育界即高達104人，包括竺可楨、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等二十三位大學校長，還有胡適、任鴻雋、曾昭倫、張志讓、陶希聖、鄭天挺等七十二位知名教授^{①9}。這表示在國難當頭之際，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對知識界的禮遇與誠意，更希望得到知識界的倚重和認同。7月15日談話會在廬山舉行，兩天後蔣介石在出席談話會時對時局發表了重要講話，向全國軍民表示了堅持抗戰的決心。31日，蔣介石約胡適、張伯苓、梅貽琦、陳布雷、陶希聖等人午餐時，亦表明他已決定與日軍作戰，說明此時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民國學人已被蔣介石視為堅持抗戰的重要力量^{②0}。

為了堅持抗戰，必須團結全國軍民，凝聚共識，其中對知識份子的態度至為重要。在這方面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確實作了不少努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別予以敘述。

1、政治：開放黨禁，動員入黨

國民黨於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即釋放「七君子」及其他政治犯，並同意開放黨禁，實施國共合作。「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關，下設國防參議會，邀請二十四位各黨派領袖及社會賢達參加，其中包括張伯苓、馬君武、胡適、蔣夢麟、傅斯年、陶希聖等多位學界人士。國防參議會存在的時間雖然不算長，但卻是抗戰爆發後各黨派人士聯合的標誌，它也成為後來國民參政會的雛形。

1938年7月6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參政員共200人，其中教育界有五十九人，幾佔全體參政員的30%，也是人數最多的界別。雖然參政員均由國民政府聘請，並非選舉產生，但他們都是社會上、學術上和經濟上享有重要地位的人士，而且國民黨籍的參政員只佔五分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以後各屆參政員的人數愈來愈多，產生的方式又改為選舉與遴選兩種，但國民黨籍參政員的比例卻不斷增加，到第四屆三次會議召開時，其比例已上升到80%以上了。

蔣介石在開放黨禁的同時，更注意吸收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著名的學人加入國民黨，最終目的當然是希望他們為其所用。1939年3月4日，蔣介石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發表演講，除了強調「教育是一切事業的根本」外，更向全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各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呼籲「以實現三民主義引為自身的責任」，加入國民黨，為共同抗戰、救國家於危亡的目標而奮鬥^{②1}。

戰前雖然也有一些知名學人加入國民黨，但人數並不算多，然而戰時在國民黨乃至蔣介石的親自關注之下，知識份子入黨的數量顯著上升。譬如西南聯大中的三位常委、亦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都是國民黨員，其他大學校長、特別是國立大學，如中央大學先後幾位校長羅家倫、顧孟餘、顧毓琇、吳有訓，浙江大學竺可楨，武漢大學周鯁生，廈門大學薩本棟，雲南大學熊慶來，重慶大學葉元龍，金陵女子

大學吳貽芳等都是國民黨員，其中多人還被委以國民黨中央委員、三青團中央幹事或監察等職務。這些校長入黨後，各校的主要行政單位負責人也在校長的「邀請」下紛紛加入國民黨，比如蔣夢麟入黨後不久，便召集聯大三校院處長以上教授「茶會」，宣布「凡在聯大及三校負責的，其未加入國民黨者，均先行加入」²²。因而學校各級行政負責人絕大部分均「遵命」加入國民黨，其他高校的情況也跟聯大差不多。

1939年西南聯大成立國民黨區黨部，雖然該校素稱大學中的「民主堡壘」，可是全校教授中的一半以上都是國民黨員，包括查良釗、鄭天挺、馮友蘭、陳雪屏、姚從吾、華羅庚、羅常培、楊振聲、李廣田、孫毓棠等，而據1944年2月的統計，聯大371名教師中，國民黨員超過150名，這還未計算職員與學生中的國民黨員以及學生中的三青團員²³；武漢大學的國民黨員有九十多人，其中包括楊端六、王鐵崖等二十位著名教授。這些學者加入國民黨的原因亦不盡相同：

其一，出於財政誘因。如私立華西協和大學校長張凌高為了獲得教育部的補貼，不得不接受陳立夫、程天放的介紹，加入國民黨，其後為爭取得到教育部的更多資助，他還動員該校一百多名教授和學生入黨²⁴。

其二，礙於政治壓力。北大歷史系教授鄭天挺後來被推薦出任西南聯大的總務長，1939年8月24日，蔣夢麟和梅貽琦特別在梅寓招待聯大三校負責人商談加入國民黨之事，鄭天挺在當天的日記回憶了他與國民黨的淵源，以及從「未入黨」到「決入黨」的轉變：1922年他自北京到福建參加革命，「雖日與黨中同志相處而未入黨」；1927年他曾代理浙江省民政廳長，平日「周旋於黨政諸要人間，亦未入黨」；1930年，他奉老師蔣夢麟之命，「入教育部任秘書主任，亦未入黨」。鄭天挺認為，對於國民黨黨義的了解，他比許多列名黨籍的黨員要深得多，信仰也比他們堅定，「所以未入黨者，不願以入黨獵官固位也」。然而「今中央既有使各大學組黨、重要人員入黨之議，為保護學校及孟鄰〔蔣夢麟〕師，決入黨」，而且他們還「建議中央推錢端升、周炳琳、吳有訓為籌備員」。1940年夏，西南聯大正式成立國民黨聯大直屬區分部，鄭天挺在日記中寫道：「自今日始，余列名黨籍矣。」²⁵類似這些聯大教授參與國民黨活動的情形在他們的日記中多有記載²⁶。

然而，蔣介石拉攏知識份子入黨的另一個目的是要控制高等學校師生的思想，1943年7月16日，蔣介石向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三青團幹事會書記長張治中、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教育部長陳立夫等人發出手諭，要求「以後各大中學內，其黨務、團務、軍訓與訓導等人員，皆應統轄於校長，受校長之指揮與考核。即本此原則，以定學校之制度，但各校校長必須皆為黨員，方足以領導黨團之人員。各校每周應舉行黨務會報一次，即由上述四部分負責人員出席參加，各校黨義一課以後應改由校長講授，俾引起學生之重視」²⁷。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準備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多次表示要在大會召開之前「徵集社會與教育、經濟界名人入黨」，並要求「六全大會前徵求名人入黨名單」，預定在「各大學教授中，選拔本黨黨員」²⁸。1945年4月7日，蔣介石向組織部長陳立夫、教育部長朱家驊發下手諭：「希於各大學教

授中保舉最優秀之黨員，每校二至三人，詳具履歷及研究項目與其專門著作等，於三星期內呈閱。」²⁹這亦反映了蔣介石此時希望改變國民黨結構的迫切性。

2、學術：資助出版，獎勵研究

蔣介石與學界的聯繫主要是通過侍從室、特別是陳布雷和錢昌照等人的協助而進行的。侍從室曾奉令協助成立藝文研究會，並贊助或支持數十種雜誌和刊物的出版（如《藝文叢書》）。蔣介石曾令以侍從室名義贊助一些學術機構及社團，譬如協助馬浮創辦復性書院，出面協助哲學界成立中國哲學會，還扶植《大公報》，利用學界和輿論的力量，擴大知識份子的參與，讓他們進入政府的體制內參政議政³⁰。

蔣介石如此關心創辦學術刊物，當然是希望藉此宣傳國民黨的方針和政策，為鞏固其統治服務。蔣介石多次強調，文學史學為國民精神所寄託，應加以提倡，以喚起民族意識。胡適在美國翻閱張其昀借給他的《思想與時代》，知悉這個刊物是蔣介石撥款資助的，主要執筆者為張其昀、錢穆、馮友蘭、賀麟等人，雖然沒有發刊詞，但每期刊載的啟事卻要求作者提供的文字必須是：「1. 建國時期主義與國策之理論研究；2. 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討」，胡適認為「此中很少有好文字」，因為「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³¹。也就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1941年中央黨部創辦《文史雜誌》，以葉楚傖為社長，盧逮曾為主編，目的就是要宣傳蔣介石的新生活思想。但朱家驊認為盧逮曾的聲名不廣，在學界的地位亦不高，為了將雜誌辦好，他曾多次函電時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的顧頡剛，催促他盡快到重慶接任。雖然顧頡剛認為「張其昀有政治野心，倚倚總裁及陳布雷之力，得三十萬金辦《思想與時代》刊物於貴陽，又壟斷《大公報》社論，賓四〔錢穆〕、賀麟、〔張〕蔭麟等均為其羽翼。賓四屢在《大公報》發表議論文字，由此而來。其文甚美，其氣甚壯，而內容經不起分析。〔辛〕樹幟讀之，甚為賓四惜，謂其如此發表文字，實自落其聲價也」³²，但還是沒有拒絕朱家驊的邀請，到重慶主持《文史雜誌》的日常事務。

抗戰期間，教育部還秉承蔣介石的旨意，盡力為高等教育實施補助。1940年5月27日，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重慶參加第一次學術審議會，經王世杰提議，每年由財政部與教育部洽商，撥美金200萬元「作為大學之設備」³³。其後教育部根據戰時國家法案，設立了「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自1941至1947年先後舉辦了六屆，本屬「臨時」、「補助」的舉措，雖然獎勵的對象很少，但確實對於高級知識份子戰時的生活有所幫助；更重要的是，由於評審權威、過程嚴密，後來成為代表國家的最高學術獎，而從評選的結果來看，當初獲獎的作品即在當下，也是學術界公認的扛鼎之作³⁴。

蔣介石還指示經濟會議秘書長賀耀祖，「對於報上所載有關經濟之論文，應隨時予以注意，並擇其有見解有才識者，設法與之聯絡，或約談考核，再擇其才幹具操守者，設法收羅為要」³⁵。也同樣是出於籠絡的目的，蔣介石對於著名學者極力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據馮友蘭回憶，凡是從別的城市到重慶去的知名人士，蔣介石都會請他們吃飯，馮友蘭每次去重慶幾乎都會受到

這樣的「禮遇」³⁶。對於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來說，蔣介石的這種態度和舉動對他們還是有所作用的。

3、生活：撥款救援，提高待遇

戰爭期間，由於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大後方的民眾生活日益貧困，其中尤以高級知識份子的境況最為明顯³⁷。對於這一現狀蔣介石並非不清楚，他也曾設想採用一些方法提高知識份子的待遇，譬如設立部聘教授，楊樹達、陳寅恪等三十位知名學者被提名出任民國三十年度(1941)首批部聘教授，除月薪600元外，每月還加發研究補助費400元；提高高校教師的薪酬，對教師和學生提供米貼和平價米，盡力維持他們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且他本人還為某些重要的學人提供過援助。抗戰之初，蔣介石曾讓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寄錢給陳獨秀，接濟他的生活³⁸。竺可楨生活艱窘，「半年以來因梅兒〔竺可楨女兒〕屢病氣喘，自渝返家旅費計一千餘元，近購魚肝油三瓶三磅八百元，朱誠中醫藥費152元，單梅一人已用二千四、五百元，故已虧空三千。適得教部轉來委員長餽賜3,000元，得此可彌補」³⁹。蔣夢麟曾告訴鄭天挺，他在重慶向蔣介石傾訴西南聯大教授生活困苦，蔣即答應「撥獎助金二十萬，已交到矣」⁴⁰。1942年7月，中央大學地質系教授朱森因生活窘困羞憤自殺，此事引起大後方知識界的強烈震動，蔣介石亦深為吃驚，他在日記中寫道，要注意「朱森教授之死案」；更將「大學教授補助金辦法之催訂」列於重要的工作計劃之一⁴¹，目的自然是要盡量減少類似的慘案再次發生。

在蔣介石對待學人態度上，以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思永兄弟的故事較為典型。抗戰之後梁思成兄弟到了大後方，生活難以為繼，林徽因、梁思永更身患重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為此曾多次寫信給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幹事長葉企孫和翁文灝，甚至直接致函蔣介石，希望政府能撥款救急。朱家驊和翁文灝得悉後先與陳布雷商談，其後便向蔣介石作了匯報。蔣介石很快就作出批示，並從他的特別經費中撥出2萬元作為補助款，由傅斯年轉交梁氏兄弟。雖然梁氏兄弟對此事原委並不清楚，但家人的病情以及生活確實得到明顯的改善⁴²。

知識份子雖然生活清貧艱苦，卻不願接受嗟來之食，為了照顧到學者的自尊，同時解決他們的一些生活困難，當政者亦曾設想過多種辦法。如前所述，1941年6月，顧頡剛應朱家驊之邀，赴重慶出任《文史雜誌》社副社長時，朱就曾對顧表示之所以創辦這個雜誌，是因為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批大學教授生活困難，政府正為他們想辦法解決，其中一個辦法就是讓文學院的教授多發表文章，取得稿費⁴³。

其實這不僅僅是朱家驊的意見，蔣介石也是這樣考慮的，他在致陳布雷電中表示，對於大學教授中生活困難者應設法予以救濟，並擬定兩種辦法：「甲、組織政治、經濟、社會以及自然科學等學會或雜誌譯書徵文，如現在補助哲學學會之辦法；乙、每大學視其教授人數之多寡，擇其家境生活最困難者，由各校長負責調查，由政府令銀行特別撥款借貸，名為信用貸款，不要利息，或最低利息，待抗戰完結後五年內分期還清，由政府擔保，但每人每年有最高借款，如最多每月以五百元、每年以五千元為限。」蔣介石計劃每年

撥款大約200萬元，若照這樣兩種方式便可以對各大學教授有所救濟，但他又強調要「專救濟真窮苦者為限，而非普通人之救濟」，要求陳布雷即將此意轉告教育部長陳立夫，令其妥籌辦法，並限於1942年暑假以前發表實行⁴⁴。

為了改善大學教授的生活狀況，根據蔣介石1942年12月31日的代電手令，教育部先後對長期在高校中任職的教員發放獎金補助，一共有1,300餘名教員得到補助，其中最高者5,000元，最低者則為1,500元，共撥款2,203,500元。收到這筆款項後，「各校教員同深感奮，頗收激勵之效」⁴⁵。由於昆明地區物價上漲幅度較高，教育部還根據蔣介石1943年7月27日代電的旨意，對雲南大學教職員工資「另按重慶標準百分之五十借撥基本生活費及按薪加成數兩個月」⁴⁶。除此之外，蔣介石還為國立專科以上高校教職員發放特別周轉金等事多次向陳立夫下達指示，據教育部報告經辦情形，「計三十七校院共發156萬元」，並規定「教職員特別周轉金為救濟特別難苦之教職員，或臨時醫藥救濟之用，應根據事實由校長切實負責核給，以資救濟，絕對不准普遍分發或一時發盡，須留作臨時救助周轉之用」⁴⁷。上述這些政策雖然不夠完善，補助數額更是杯水車薪，但應該承認的是，蔣介石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為了改善知識份子的處境，確實也作過一些努力。

(二) 排斥異己

蔣介石雖然致力拉攏知識份子為其服務，但前提是知識份子必須聽命於黨國和服從他的旨意。表面上他尚能表現出禮賢下士、虛心納諫的態度，但實際上他內心是愛憎分明的，在日記中時常能看出他對於那些異見者的不滿、厭惡和憤怒，甚至不惜動用政權的力量加以迫害，其中馬寅初就是一典型的個案。

馬寅初是著名的財政學家，原與國民黨關係甚好，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曾受聘參與浙江省的建設，後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兼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經常對時政發表意見。抗戰爆發後，馬寅初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開始公開抨擊政府高官中的腐敗現象，矛頭直指孔、宋豪門資本，引起蔣介石的強烈不滿。學界同仁都知道這一情形，並深為馬寅初的處境擔憂。竺可楨在日記中說：「寅初近來對於孔、蔣大肆抨擊，為宋家三姊妹積錢至一千八百萬美金，應以此款用於抗戰，曾屢次演講，並於《時事類編》上作文提及此事，故蔣曾加以四次警告，並召渠前往談話，渠不去。蔣乃召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面加責難，囑其辭去寅初，卒不果云云」，而且「寅初並述及為朋分飛機款為錢大鈞告發，宋靄齡姊妹所恨，幾為蔣所槍斃」⁴⁸。他還說，「《時事類編》五十七期有馬寅初《對發國難財者徵收臨時財產稅》一文。日來米價又在高漲，今日到每斗五元四，多半由於商人操縱，故寅初文自受人歡迎，但實行殊困難，以奸商營業殊難查出確數」⁴⁹。

馬寅初攻擊孔、宋豪門資本，蔣介石多次約其見面亦不至，終於引起蔣介石的憤恨，打算以送他到前線考察為名予以軟禁。儘管王世杰等人認為這樣處置不妥，但馬寅初還是被憲兵從家中抓走，囚於重慶衛戍司令部，後遷

移到貴州的息峰集中營關押。對此事蔣介石是這樣認為的：「本日押解馬寅初在憲兵司令部，以此人被共黨包圍，造謠惑眾、破壞財政信用也」；「監視馬寅初不法行為，似非過當也」^⑤。

除了馬寅初之外，蔣介石對那些主張憲政者如張君勱、黃炎培、羅隆基、潘光旦、張奚若等人亦極為不滿。鄭天挺在日記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載：蔣夢麟曾對鄭天挺說，這次去重慶見到蔣介石，他對羅隆基十分不滿，懷疑最近鬧學潮就是潘光旦、張奚若和羅隆基這幾個人從中挑動的。蔣夢麟雖然代為解釋，但根本無濟於事。陳布雷和陳立夫告訴他，蔣介石對羅隆基之所以不滿，不單單為學運事，主要還是因為他挑撥中央與地方關係，因此堅決要求西南聯大將其辭退。最終聯大頂不住壓力，只能以約滿為由，將羅隆基辭退^⑥。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共關係日趨緊張，在重慶的民主人士為了挽救時局，計劃成立一政黨，從中斡旋。12月5日，蔣介石聽聞各黨派擬組織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前身），痛心不已，他以為「該同盟份子複雜，所謂國社黨、青年黨、共產黨等等，皆拉雜加入，而其國社報、光明報、華商報等，在香港出版，對於中國政治、社會、軍事、經濟各種弱點，不僅暴露無餘，而且造謠誣陷，諸凡不可思像、匪夷所思、無稽之言，每日揭載，無所不用其極。此不僅企圖毀滅政府，推翻國民革命政權，實欲使敵寇知我弱點，誘之加緊侵略，惟恐我抗戰失敗之不速也」。在他看來，「文人政客之作惡，可說至今已極；而香港英政府則一方要我合作，而一方任反動派在其保護之下，盡量妄為。嗚呼！我國環境之惡劣，歷代所未有也，痛心無以復加」^⑦。

1942年1月，昆明等地爆發「倒孔風潮」，蔣介石聞之至為憤怒，他認為這是「反動派鼓動昆明各大學學生遊行示威，以庸之〔孔祥熙〕為其目標。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張君勱之流，可謂喪心病狂極矣」^⑧。同年5月，教育部下令對各大學的教授資格進行審查，西南聯大教授張奚若、燕召亭等聞訊後竭力反對，並主張召開教授會予以抵制。然而此事很快即為蔣介石所知，下令嚴查。鄭天挺對於消息外洩感到奇怪，「豈教授中有作特務工作者耶？」^⑨這也就說明國民黨的情報工作可能已滲入大學的教授之中^⑩。

抗戰勝利前夕，全國民眾都希望戰後中國成立一個聯合政府，逐步走向民主，左舜生等七名國民參政員提出先實現民主措施再召開國民大會的提案，引起蔣介石的極大不滿，他認為「左〔舜生〕、王〔黃炎培〕等參政員借名共黨反對召集國民大會，否則就是政府準備內戰、製造分裂之口號加以恫嚇〔嚇〕，而若輩即以此從中操縱，挾以自重」。蔣介石斥責道：「此等無恥政客實為漢奸之不如，對於國家前途之安危存亡毫不之顧，而惟以私人之近利是圖。」^⑪這說明蔣介石對待學者名流的態度涇渭分明，立場非常明確，那就是若能順從黨國的旨意，或至少不公然表示反對，那麼彼此之間好來好往，蔣介石也可以以禮相待，甚至邀請出任相關職務；但若處處與政府唱對台，不尊重領袖的地位與意志，那政府就會採取一系列的報復、打壓乃至於人身迫害了。

三 學人的態度：以顧頡剛為例

(一) 抗戰前及戰時的態度

民國時期學人的家境經歷不同，政治立場各異，對於政權與領袖的態度並不一致，即使是同一個人，在各個時期也會發生變化。儘管民國時期學人的表現和政治立場有所不同，但一般來說，他們的人格還是相對獨立的，雖然對權勢、對政府存有敬畏心態，但也不是絕對盲從，在統治者面前，他們尚能保持自己的價值判斷，追求自由與獨立的精神^{⑤7}。

民國學人大致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一、基本上不問政治、只是研究學術的單純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二、雖然對政治有一種關懷、卻不願參預其間，如傅斯年、顧頡剛等；三、原本是學者，後被當局者拉入政府並擔任重要職務，如朱家驊、王世杰、翁文灝等^{⑤8}。儘管這些學人對入仕的態度有所分別，但在他們身上大都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精神，亦不曾忘卻身為知識份子應對國家民族所承擔的責任，因而他們對政治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關懷。

顧頡剛可以算是上述第二類即議政但不參政的學者，他年輕時即開始記日記，六十多年幾乎從未中斷。他對自己所寫的日記極為珍視，視為「生命史上最寶貴之材料」，當中記述了他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態度。顧頡剛雖然是一個學者，但他對政治也相當關心。他曾於1912年加入中國社會黨並參與相關活動；其後考入北京大學，除了鑽研學術外，亦積極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大革命時期，他在政治上持親國民黨立場，1927年初，正當國民黨北伐節節勝利之際，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勸他回國後「似以不做政治活動為宜」，但又提醒，「如果要做，最好加入國民黨」，因為他「深感到國民黨是一個有主義、有組織的政黨，而國民黨的主義是切中救中國的」。他還「感到這一次的革命確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級社會的革命，這一次是民眾的革命」。他說自己對此亦深表同情，如果不是為了埋頭致學的話，也會加入國民黨^{⑤9}。

對於蔣介石，顧頡剛的態度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轉變過程。「九一八事變」後，燕京大學成立中國教職員抗日會，顧頡剛擔任宣傳幹事，負責出版通俗讀物向民眾宣傳，堅決主張對日進行抵抗。1933年長城抗戰之際，顧頡剛得知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打得很好，打出了中國人的志氣，但卻聽說「蔣介石派邵元沖去，以慰勞為名，勸其停戰」，難道「蔣氏殆思屈辱耶？此人真萬死不足蔽辜」。他還聽說「我方不設糧站，前線軍人至苦，蔣氏之罪通於天矣」^{⑥0}。這說明此時顧頡剛不僅對蔣介石的對日政策不予贊同，甚至是嗤之以鼻的。

然而顧頡剛要推動他的社會活動和事業發展，就必須與政府保持一定的聯繫，1933年顧頡剛在教育部長王世杰的支持下，成立通俗讀物編刊社；1936年他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葉楚傖、朱家驊的支持下，在北平秘密籌辦新聞事業，獲當局提供經常研究費每月5,000元，開辦費1,500元。因此他自然對國民黨與蔣介石保持尊重。

在民國學人中，朱家驊可以說是學者從政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顧頡剛與朱家驊的關係向來很好，他曾接受朱的延攬，出任中山大學教授。1936年1月，顧頡剛為創設及維持禹貢學會籌款之事，特意到南京求見朱家驊，朱對他的要求表示同意，但同時又勸其加入國民黨，說這樣以後便於合作，顧頡剛最終同意入黨^⑤。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回奉化老家休養，朱家驊想介紹顧頡剛去見他，然而蔣介石「脊骨未癒，醫囑須靜臥半月」，遂託陳布雷代為接見。但陳布雷也很忙，只是說他已看到顧頡剛給朱家驊寫的信，很是欽佩云云，並勸顧頡剛萬萬不可灰心，表示「工作固有接續之希望也」^⑥。

1941年1月7日，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致函顧頡剛，稱中央秘書處擬創辦一《文史》半月刊，每月經費5,000元。朱家驊表示，「此種刊物純為學術論文，足以左右一時風氣」，並已徵得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同意，聘請顧頡剛前來重慶主持刊物。1月19日顧頡剛回函，以身體、家庭、齊魯大學之事務及影響力不如從前為由，予以辭謝。24日，朱家驊再次來函，稱「中央擬創辦之《文史》半月刊，關係至為重要，葉、戴〔季陶〕諸公雅相器望，咸以此事非兄莫屬」，仍力邀顧來重慶就職^⑦。同年6月，顧頡剛應朱家驊之邀，赴重慶出任《文史雜誌》社副社長，社長由葉楚傖掛名，具體事務則由顧頡剛負責。在這之後一個月，顧頡剛終於在重慶見到了蔣介石。7月13日上午10時，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汽車來接顧頡剛，先到陳布雷家，再乘汽車渡江，到黃山謁見蔣介石。顧頡剛當天身體有病，但同行的辛樹幟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時「頗能侃侃而談」。顧回來後在日記中記述與蔣談話主要是整理古籍和經學之事，然而對蔣介石「只知山東神童江希張，使我心冷」^⑧。

1943年1月，中國與英、美兩國簽訂新約，廢除了一百多年以來強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消息傳來，舉國振奮。據顧頡剛回憶，當時中央黨部有人提議由民生工廠鑄造九鼎獻給蔣介石以示致敬，而中央大學的學生則推請他撰寫鼎銘。顧頡剛於是就讓歷史系學生劉起鈺擬寫，他只是對銘文予以修改而已，但幾天後報上發表時說是他撰寫的，他認為這恐怕是因為其地位高、以其名為重的意思。在他看來，修訂新約對於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件大喜事，就是中共在當時應該也不會反對^⑨。

顧頡剛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中國與英美之新約既成，各學校黨部及工廠黨部欲向蔣委員長獻九鼎，而以鼎銘屬予，因就起鈺所草，加以改竄。」鼎銘曰：「（一）萬邦協和，光華復旦。（二）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然而沒想到「此文發表後，激起許多方面的批評，使予自慚」。傅斯年並說此舉「大受朋輩不滿」，陳寅恪甚至「比予於王莽時之獻符命」。顧頡剛聞後心中不服，以為「諸君蓋忘我之為公務員，使寅恪與我易地而處，能不為是乎！」^⑩其中「公務員」一詞說明他此時有一種強烈的國家意識。關於此事竺可楨在日記中也有記載：「寅恪對於騷先等發起獻九鼎、顧頡剛為九鼎作銘，驚怪不已。謂頡剛不信歷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詩嘲之云：『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愚分明有此身。』」^⑪這都說明獻鼎之舉當時在大後方知識界所引發的巨大迴響^⑫。

獻鼎之事最後雖然未成，但此舉還是讓蔣介石對顧頡剛抱有好感。這一年的3月，教育部花費了十多萬元，在重慶倡導成立中國史學會，邀請大後方雲南、貴州和廣東等地的大學教授前來參加。顧頡剛以為，「說教部提倡學術，殆無此事；有謂延安正鼓吹史學，故辦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因為他與教育部長陳立夫關係惡劣，原本不想出席，但又怕因此受到打擊而勉強參加，沒想到最後他得票最多。他猜測，「此事恐係蔣委長發條子與教部辦者，條子上舉我之名，故彼輩不能不推我出來，俾好向委長報銷」。然而「觀於史地教育會部發新聞，不列我名，可知部中仍排斥我」^⑥。

抗戰勝利後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係已經逐漸疏遠，但政府相關部門對他仍然相當關心，從選舉國大代表之事即可以得到證明。1947年11月，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國民代表大會進行直接選舉，顧頡剛原本並未計劃參加競選，可是在選舉前突然收到教育部人事處主任的來信，說他競選教育團體國大代表之事已由政府圈定。顧聞訊甚為詫異，心想「我不但未競選，且未起此心，誰為我覓五百人簽署耶？」^⑦

應該說，顧頡剛代表的依然是當時大多數學人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態度，他們大都具有國家主義的思想，贊同國家統一，雖然對國民黨的專制有所不滿，但還是認同其合法統治，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他們都擁護蔣介石為國家最高領袖，支持他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然而，抗戰勝利後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局勢的變化，尤其是國民政府所表現出來的專制、腐敗日甚一日，他們的立場和態度也就隨之發生變化。

(二) 關鍵時刻的抉擇

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著名學者，顧頡剛身上具有極為濃重的國家主義與正統思想。抗戰勝利之初，國共兩黨都在積極爭奪對日軍的受降權，搶佔地盤，但在顧頡剛看來，「共產黨跋扈鳴張，存心割據，要日軍向彼投降，要自己選出代表參加聯合國會議，要美國對國民黨政府停止租借法，簡直要使中國立刻分裂。國民新逢勝利，正謂兵革無懼，乃內戰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別有心肝之人，無不痛恨共產黨者，此真有禍中國也」；雖然「國民黨固不滿人意，但今日之中國實不容分裂」^⑧。他堅持中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認為剛剛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出賣了中國人民的利益。8月27日，他在報上看到傅斯年為中蘇新約辯解的報導感到不齒，認為傅就是一個道地的「御用學者」，而「此一段話，當他是幫王世杰說的」。顧頡剛認為「割地即割地，獨立即獨立，偏要替他想出理由，何無恥也！」^⑨

然而隨着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顧頡剛對國民黨的執政愈來愈不滿，關係亦日益疏遠。譬如「中央黨部開會三次矣，每次必招，予未一往，予誠不能黨也」^⑩；再譬如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與教育部長朱家驊聘請他擔任東北行轅教育處長暨教育部東北特派員，對於這一掌管東北九省教育大權、主持東北史地學會的職務，他亦婉言拒絕，「予為國家作事，本甚應當。惟京滬工作業已展開，將交付何人乎！」^⑪1947年國民黨要求黨員重新登記，但顧頡剛卻沒有去登記，「我脫離了國民黨了，精神上是怎樣的鬆快！」^⑫

1948年11月，遼瀋戰役結束，淮海戰役（徐埠會戰）剛剛打響，國民政府推行的金圓券政策也露出失敗的跡象，民眾對國民黨的統治日益不滿。顧頡剛曾與幾位朋友交流對國事的看法，他認為，「今日軍事尚有辦法，而政治則絕無辦法」，因為國民黨「已被二陳變為CC，軍事長官已被陳誠『整軍』所更換，經濟則破壞於孔、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再者因為幣制改革、通貨膨脹，「各部之總務司都以幣值之貶，扣留不發，自做生意，官場腐化，逼得人不能做事」^⑥。此時聽聞和談的消息，眾人皆喜，他認為其實人心並不是完全傾向共產黨，而是因為太討厭國民黨，「國民黨已失盡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權」^⑦。

當此政局動亂之際，顧頡剛對國民黨已全然失去信心，但他對中共又缺乏了解，甚為恐懼，將來是否南下廣州或是遷移台灣，他考慮再三，對於「前途演變，不知如何」。正在這時顧廷龍轉來鄭振鐸的傳話，讓他「不必東跑西走，左傾歷史學家甚敬重他」，顧頡剛心中感歎：「在此大時代中，個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聽之於天而已。」^⑧因此，當胡適被國民政府派專機從北平接回南京後，顧頡剛還去信勸他不要留在南京，「免入是非之窩」，並說「當國民黨盛時，未嘗與共安樂；今當倒壞，乃欲與同患難，結果，國民黨仍無救，而先生之令名墮矣」^⑨。

再看看顧頡剛對蔣介石態度的轉變。上文提及1941年他曾由陳布雷陪同晉見過蔣介石，除此之外，他在日記中還提到有幾次見面的機會，如1945年4月11日「到蔣主席官邸吃飯」，蔣介石表示要讓三青團「脫離政治關係，成一與童子軍銜接之教育性的團體，並擬此後禁止學生入黨，免得各黨競拉學生，使學校不能安定」。顧認為「此事固好，惜太遲矣」^⑩。7月20日，「今日下午同赴主席茶會」。但此次是與眾參政員一起前往的，並無直接交談^⑪。1948年1月20日，「見蔣主席，面陳教科書貸款事，謂可商量，當召徐柏園計議。又陳民眾讀物事，謂甚好。予請銷至部隊，亦允可」^⑫。但這幾次見面人數較多，沒有與蔣介石直接對話，即使單獨見面，也只是傾訴圖書出版的困難，要求得到幫助，似乎並未涉及其他方面。

然而到了1948年底，隨着顧頡剛對國民黨徹底失去信心，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也從以往的尊重、崇敬，到疏遠、失望、不滿，甚至於厭惡了。當他聽說國民黨提出的所謂和談只是一紙謠言時，對蔣介石不禁大失所望，認為「蔣氏尚想硬幹到底，其如人心已失何！」^⑬不單單是顧頡剛，其他學人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也轉而持反對態度了，譬如竺可楨曾與生物學家秉志談論局勢，他認為「國民黨之失，乃國民黨之所自取。在民國廿五六年，蔣介石為國人眾望所歸，但十年來剛愎自私，包攬、放縱貪污，卒至身敗名裂，不亦可惜乎？」^⑭而以著名學界領袖為主要作者的《觀察》雜誌的取向就更能說明問題，對此以往已有很多研究，此處不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其後國民黨軍隊經常派遣飛機轟炸上海，顧頡剛對蔣介石此舉心生厭惡，日記中常有記載：「聞蔣方飛機投下傳單，謂十五日來上海炸。此人倒行逆施如此，安得不敗！」（6月13日）；「蔣家機兩日均來，炸黃浦江邊船隻及火油庫，頗傷人。此人如此搗亂，直與民眾為敵，可厭甚矣」（6月21日）；「今日飛機又來，盤旋一小時許，在閘北、北站

及靜安公墓投彈，死傷數百人（後聞達千人）。蔣氏臨沒落還要闖禍！」（6月29日）；「前日下午二時，蔣機來炸十六鋪，死卅餘人，傷七十人。今日上午十時，又來炸數次，聲甚巨，覽報，悉又是十六鋪一帶。有本領，應到前線去，或收復失地，現在儘作損人不利己之事，以老百姓生命為兒戲，豈英雄耶！」（10月15日）而當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時，顧頡剛則認為「此君真厚顏」（1950年3月1日）⁶⁵。這大概能說明顧與蔣的關係已經發生決裂了。

四 抗戰後知識界與政府關係的疏離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儼然以四強之領袖居於國際舞台，在國內也曾是萬眾擁戴的最高元首，然而還都後未久，國民政府的統治就呈衰敗之象，他的個人形象也日益低落，民眾的心理愈益對國民黨不滿，知識界與政府的關係也日漸疏離。對於這一變化蔣介石亦深感憂慮，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曾對他說，目前各界對當政者最大的不滿不是別的，而是「政府已失人心」。蔣介石聽後認為「無異為我下一當頭棒，惶愧無已」，但他又認為「彼未見匪區人民之痛苦十倍於此，所謂人心向背者豈有標準乎。余以為可憂者在世無是非耳」⁶⁶。他對學人的態度也是好惡兼備，偶或反覆多變，言行不一。譬如他一方面約民盟秘書長張東蓀吃飯，另一方面在日記中又斥之為「一小人儒也」，而且認為「最近文人類皆如此，一面惡共，一面懼共，故不得不附和之，以為將來求饒之地也」⁶⁷。

抗戰勝利後學潮不斷，蔣介石對此更是束手無策。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發戰後第一次重大學潮，蔣介石認為此「雖為共匪所主持與煽惑，而我黨幹部軍政當局之無知識無能力竟造成慘案，徒供反動派之口實」，並向雲南省主席盧漢下達指示：「如萬不得已時，即應解散其罷課各校。關於學生之安置，應準備集中軍訓，並望積極籌備，以防萬一。」因為在他看來，「該校思想複雜，秩序紊亂，已為共匪反動派把持，不可救藥矣，自由主義誤國害學之罪甚於共匪，為不可宥也」⁶⁸。針對日益洶湧的學生運動，蔣介石在1946年12月31日日記的「反省錄」中寫道：「學生幼稚無知，固無論矣，而其一般教授既不能領導學生、管理業務，又不能自治自理，只知爭先還鄉，索款需用。士品之頹落，學風之敗壞，幾乎為此少數自由份子中所謂民主同盟之流，將禮義廉恥之民族德性掃地殆盡。尤以西南聯大中之清華教授聞一多等五、六人為最劣。」

當國共內戰愈來愈激烈之時，《大公報》創辦人胡霖曾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表示，上海各界六十餘人聯署，希望美方出面促請蔣介石下野，由張群負責，以期打開局面。蔣介石得知後極為憤怒，他以為胡霖「本陰謀之政客，萬不料卑劣無恥至此，是誠洋奴成性，不知國家為何物」。接着他又將其推演至其他知識份子與社會名流，認為他們「大都均以洋人為神聖，國事皆以外國態度為轉移。民族自信心之喪失如此，若不積極奮鬥圖強，何以保種與立國也」⁶⁹。這也充分表現出蔣介石對知識份子「以洋人為神聖」的不滿。

1947年5月間，南京、上海、北平等各大城市的學校相繼爆發學潮，對國民黨的統治造成重大衝擊，蔣介石認為這是各大學的校長、教授「無能、無德，不能統禦學生」所致，當然也因為「物價高漲，公教人員生活困迫，一部〔分〕教授被其利用」，以致「大學學生且多為共匪宣傳與組織所脅制」^⑩。因為生活問題，北京大學八十多位教授自1948年10月25日起宣布罷教三日。蔣介石在當日日記中寫道：「北京大學教授八十餘共同罷教，廿二日以生活困難，要求借薪兩月為詞，其學生又全部給公費。下午，其校工與助教亦皆罷工，此乃共匪外圍之陰謀，乘軍事緊急之際，在我後方搗亂響應也。」

蔣介石欲採取鎮壓的手段解決學潮，但卻遭到各大學校長與教授的反對，他在1948年8月28日日記中寫道，「對各大學共匪潛伏份子之逮捕時，初時各大校長皆猶疑不定，其中反動教授更為反對執行」。戰後曾出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後來回憶說，儘管多數大學校長和很多教授都是國民黨員，但他們卻同情學生反政府的運動，而對政府的舉措則表現得十分冷漠。吳國楨分析其中的原因，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長期以來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教授的生活每況愈下^⑪。

不過應該承認，蔣介石對那些知名學者還是關心的。1944年11月4日，中國科學社聯合各科學團體在華西大學舉行慶祝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大會暨第三十屆年會，蔣介石專程致電，予以祝賀^⑫。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經過多次遴選，終於選出了八十一位院士，都是中國知識界菁英中的菁英。同年9月23日，中研院在南京舉行該院成立二十周年暨第一屆院士會議。與此同時，人民解放軍發動濟南戰役，並於9月24日佔領濟南。蔣介石聞訊自然是悲憤莫名，但同時又得知中研院第一屆院士會議召開，他以為「此乃學術界建設之基礎，得此在憂患中藉以自慰也」^⑬。

然而，蔣介石等人沒想到的是形勢發展如此之快，國共軍事力量的對比瞬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兩個多月後遼瀋戰役結束，徐埠會戰業已開打，戰火已接近國民黨統治的中樞。在此情形之下，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召集會議，決定停止該院的所有基建項目，準備遷移台灣，重點游說以中研院院士為代表的那些學人。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戰役打響，蔣介石即召集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等人擬訂派遣專機搶救平津學術及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計劃，但最終只有胡適、陳寅恪、梅貽琦、英千里、錢思亮等幾位學者上了飛機，其餘多數教授都選擇留下來「靜觀其變」。舉例來說，中研院第一屆院士共有81位，在決定中國未來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只有9名院士跟隨國民黨去台灣，12名院士去國外，其餘60名約佔74%的院士都選擇留在國內，蔣介石擬訂的搶救學人計劃最終慘遭失敗。儘管這些學人選擇留在大陸不去台灣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他們普遍對國民黨、對蔣介石失去信心則是不爭的事實。

五 結語

綜上所述，蔣介石對民國學人的態度可以說是既愛惜關懷，但又猜忌懷疑，甚至時有憤懣之心。對於知識份子的才識，一向推崇儒家思想的蔣介石

自然是希望天下才士盡為其所用，但這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知識份子必須服從他的統治權威，維護黨國的利益。因此，他對於知識份子身上存在的那種獨立意識和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精神，特別是對他們反對其一黨專制的方式十分忌恨，甚至不惜採取一些強制手段予以迫害。

民國學人大都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在他們身上普遍存在着爭取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的追求，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追求是並行不悖的。然而蔣介石卻「對現行教育深為不滿，尤不滿於『五四運動』，嘗稱之為『亡國的五四運動』，並謂『五四運動』較之軍閥尤甚」^①。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出於穩定政權的需要，國家急需集聚各方力量建設國家，其中知識份子的作用尤顯重要，蔣介石對知識份子的態度有所變化。「九一八事變」後，一批知名學者被延攬加入政府，並擔負重要職務。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民族獨立、救亡圖存成為全國民眾首要任務，國民黨也作出某些開放黨禁、共赴國難的舉措。儘管很多知識份子不滿於國民政府的黨國體制，但是為了抗日禦侮，他們仍然擁戴蔣介石作為抗戰的最高領袖。抗戰期間，內遷大後方的高校教授都能與國家和民族一起堅持抗戰，共體時艱，為繼承與發展中國的文化和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由於物價高漲，生活艱窘，特別是親眼目睹大後方的貪腐情形日益嚴重，他們的心態自然會發生變化。雖然像聞一多、潘光旦、吳晗那樣激進反對政府的學人並不算多，但從支持轉而批評政府的教授卻愈來愈多，這種影響還延續到抗戰勝利之後，導致他們對國民政府態度發生轉變，顧頡剛就是其中一個生動的例子。

儘管蔣介石對民國學人採取禮賢下士、爭取為其所用的策略，但由於黨國體制的特徵與民國學人追求的民主自由絕然不同，加上生活的日益貧困，也是知識份子對國民黨失去信心的重要原因。抗戰期間，為了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廣大知識份子尚能團結對外，認同國民黨與蔣介石的領導權力；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依然堅持一黨專制，迫害異己，經濟上政策失誤，腐敗橫行，通貨膨脹，民眾生活苦不堪言。以往生活優渥的知識份子亦飽受折磨，以致與國民黨離心離德，最終與其分道揚鑣，徹底決裂，這是否又是歷史的必然呢？

註釋

① 譬如陳三井：《舵手與菁英：近現代中國史研究論叢》（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汪朝光主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收入了多篇介紹蔣介石與知識份子關係的論文，如呂芳上：〈蔣介石：一個「繼承性創業者」初期人際網絡的建立〉、金以林：〈蔣介石的1932年〉，頁22-27、203-31。王晴佳：〈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後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頁25-48；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125-47，則分別以西南大學為中心，探討戰時知識份子與政府間的關係。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則以朱家驊為個案，探討民國時期學者從政的心路歷程。

②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1年12月24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為節省篇幅，本文所引日記，如在行文中明確說明日期，不再另註。

- ③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2年3月20日。
- ④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頁37。
- ⑤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2年4月4日。
- ⑥ 金以林：〈蔣介石的1932年〉，頁203-31。
- ⑦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16日。
- ⑧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22日。
- ⑨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24日。
- ⑩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六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1932年12月2日，頁635。
- ⑪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2年7月19日。
- ⑫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2年8月4日。
- ⑬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2年8月5日。
- ⑭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2年9月1日。
- ⑮ 參見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512、562、593、400。
- ⑯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36年4月15日，頁29。
- ⑰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5日。
- ⑱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3日。
- ⑲ 參見呂芳上：〈凝聚抗戰共識——廬山談話會的召開〉，載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8），頁25-26；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147-50。
- ⑳ 竺可楨參加了廬山談話會，他在日記中對這次談話會記載甚詳，參見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一冊，1937年7月間記錄。
- ㉑ 參見蔣介石：〈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1939年3月4日），載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六（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127-30。
- ㉒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97。
- ㉓ 詳見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頁131。
- ㉔ 參見王東杰：《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過程（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295。
- ㉕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1939年8月24日，頁181-82；1940年6月14日，頁280。以下簡稱《鄭天挺日記》。
- ㉖ 如1941年5月15日晚，西南聯大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即約「鍾天心、周枚蓀、錢端升、查勉仲、姚從吾、陳雪屏合請校中同仁三桌，飯後談黨及請大家入黨的意思」（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頁32）。1943年3月12日，鄭天挺「晚飯前至文化巷南開辦事處參加聯大區黨部會，……新入黨者華羅庚、雷伯倫、陳省身、孫毓棠」（鄭天挺：《鄭天挺日記》，下冊，1943年3月12日，頁672）。
- ㉗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五十四冊（台北：國史館，2011），頁85-86。
- ㉘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21日、2月28日〈本月大事預定表〉、4月4日。
- ㉙ 王正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六十冊（台北：國史館，2011），頁239。
- ㉚ 參見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7），頁178-86。
- ㉛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1943年10月12日，頁179。
- ㉜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四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1941年11月10日，頁602。

- ③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一冊，1940年5月27日，頁434。
- ③④ 參見賴岳山：〈1940年代國民政府教育部「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史事探微〉，《民國檔案》，2017年第4期，頁131-41。
- ③⑤ 〈蔣介石致行政院經濟會議秘書長賀耀祖手諭〉（1941年12月8日），載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四十七冊（台北：國史館，2010），頁615-16。
- ③⑥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97。
- ③⑦ 關於這一問題，參見鄭會欣：〈戰時後方高級知識份子的生活貧困化：以幾位著名教授的日記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1期，頁59-77。
- ③⑧ 詳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761-63。
- ③⑨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一冊，1942年11月2日，頁623。
- ④⑩ 鄭天挺：《鄭天挺日記》，上冊，1942年11月5日，頁626。
- ④⑪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21日、9月30日。
- ④⑫ 詳見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三卷（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1246-48、1252-54、1280-83；李學通等整理：《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1942年9月16日、28日，頁811、814。關於這個故事還可參見岳南：《南渡》（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1）；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的相關章節。
- ④⑬⑭⑮ 劉俐娜編：《顧頡剛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183；182；181。
- ④⑯ 〈蔣介石致陳布雷電〉（1942年6月20日），蔣中正檔案，台北國史館，002-010300-00049-015。
- ④⑰⑱ 孫武選輯：〈國民政府教育部經辦1943年度蔣介石手令與訓話情形報告〉，《民國檔案》，2013年第3期，頁39；40；48。
- ④⑲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一冊，1940年10月20日，頁462。
- ④⑳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一冊，1940年11月17日，頁466。
- ⑤⑰ 蔣介石：〈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40年12月6日、7日。
- ⑤⑱ 鄭天挺：《鄭天挺日記》，上冊，1941年2月17日，頁518。
- ⑤⑳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台北：國史館，2011），頁810-11。
- ⑤㉑ 蔣介石：〈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17日。
- ⑤㉒ 鄭天挺：《鄭天挺日記》，上冊，1942年5月21日，頁558。
- ⑤㉓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227-68。
- ⑤㉔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5年7月15日。
- ⑤㉕ 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的選舉就是一個明顯的事例。1940年3月，中研院院長蔡元培於香港病逝，在新院長改選的過程中，蔣介石突然「下條子」，欽點顧孟餘為院長人選，但最終中研院的評議員卻沒有給蔣介石「面子」，讓最高當局為之震驚，但又無可奈何接受這一結果。此事經過可參見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適的信函，《傅斯年遺札》，第二卷，頁829-30；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頁250-60。
- ⑤㉖ 這一觀點很多學者均已指出，譬如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歐陽哲生教授在論著中及課堂上都予講過。參見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頁11。
- ⑤㉗ 〈顧頡剛致胡適函〉（1927年2月2日），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304-307；《顧頡剛自述》，頁139。
- ⑤㉘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三卷，1933年3月16日，頁24。
- ⑤㉙ 參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77-78。但顧自己又說是1934年加入國民黨的，參見《顧頡剛自述》，頁179。
- ⑤㉚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三卷，1937年2月6日，頁598。陳布雷在同一天的日記中亦只是簡單提及「八時一刻、顧頡剛、馬壽齡來訪」一句，並無其他

記載。參見《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頁195。

- ③ 顧頡剛：《顧頡剛書信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385-87。
- ④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四卷，1941年7月13日，頁558。關於顧頡剛這次晉見蔣介石之事陳布雷在日記中亦有記載。陳布雷說當日午餐之後主客談話約一小時，「委員長對顧君等殷殷以昌明文教為囑，謂今日欲復興民族，必須重視史地教育，更須昌明中國之哲學」云云。參見《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1941年7月13日，頁489。
- ⑤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五卷，1943年1月28日、5月13日，頁18、72。
- ⑥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二冊，1943年12月18日，頁720。
- ⑦ 與顧頡剛正好相反，聞一多原本是位具有強烈國家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然而就在蔣介石以自己的名義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之後，聞一多的態度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他不但摒棄了以往擁護蔣介石及政府的主張，其思想亦日益激進。
- ⑧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五卷，1943年3月31日，頁50。
- ⑨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1947年11月5日，頁153。
- ⑩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五卷，1945年8月20日，頁513。
- ⑪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五卷，1945年8月31日，頁520-21。
- ⑫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五卷，1946年3月27日，頁631。
- ⑬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1947年2月9日，頁20。
- ⑭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1948年11月11日，頁372。
- ⑮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1948年12月16日，頁390。
- ⑯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1948年12月28日，頁397。
- ⑰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1949年1月17日，頁406。
- ⑱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五卷，1945年4月11日，頁439-40。
- ⑲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五卷，1945年7月20日，頁499。
- ⑳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1948年1月20日，頁217。
- ㉑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1948年12月17日，頁390。
- ㉒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二冊，1949年5月26日，頁1256。關於竺可楨與政府間關係的嬗變，參見何方昱：〈黨化教育下的學人政治認同危機：去留之間的竺可楨(1936-1949)〉，《史林》，2010年第6期，頁133-40；康建武：〈竺可楨對國民黨執政現實的觀感述論〉，《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4期，頁145-47；皮國立：〈知識份子眼中的蔣介石：以《竺可楨日記》(1936-1949)為中心〉，載羅敏主編：《在日記中尋找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309-348。
- ㉓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頁472、475、478、534、603。
- ㉔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7年5月25日。
- ㉕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7年1月21日。
- ㉖ 蔣介石：〈蔣介石致盧漢手諭〉(1945年12月6日)，蔣中正檔案，台北國史館，002-080200-00582-004；《蔣介石日記》，1945年12月7日。
- ㉗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8年1月19日。
- ㉘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7年5月31日。
- ㉙ 裴斐、韋慕庭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40。
- ㉚ 《大公報》，1944年11月4日，第3版，全文參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七冊(台北：國史館等，2014)，頁772。
- ㉛ 蔣介石：〈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48年9月25日。
- ㉜ 鄭天挺：《鄭天挺日記》，下冊，1943年11月23日，頁760。